

解放区的电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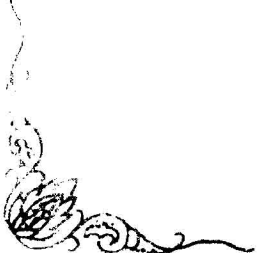


中国电影出版社

解 放 区 的 电 影

袁牧之 等 著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内 容 说 明

本书收集了有关解放区电影的情况和回忆文章十一篇（另附录一篇），在这些文章里，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叙述了当年党对解放区电影事业的正确领导和深切关怀。在当时技术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电影工作者发扬了高度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跋山涉水，出入敌占区间，为摄制人民自己的影片而忘我地工作。本书提供了从抗日战争初期延安电影团的创建，到各解放区电影活动开展的材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早期人民电影事业发展的概貌。

解放区的电影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2⁵/₈插页：8 字数：66,000

1962年3月第1版 1984年12月第2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5001——8,000册

统一书号：8061·892

定价：0.72元

目 次

关于解放区的电影工作·····	袁牧之 (1)
-----------------	---------

亲切的回忆·····	吴印咸 (7)
------------	---------

《延安与八路军》及其他·····	徐肖冰 (9)
------------------	---------

随朱总司令回延安·····	吴本立 (12)
---------------	----------

一部在延安诞生的影片

——记《南泥湾》的摄制·····	钱筱璋 (17)
------------------	----------

延安电影团的放映队与观众·····	席 珍 (22)
-------------------	----------

在党的怀抱中成长·····	姜云川 (26)
---------------	----------

最初的甘苦·····	钱筱璋 (29)
------------	----------

在陕甘宁边区工作的时候·····	程 默 (41)
------------------	----------

纪录片《新四军的部队生活》是怎样拍成的? ·····	薛伯青 (45)
----------------------------	----------

从延安电影制片厂到西北电影工学队·····	锺敬之 (51)
-----------------------	----------

装在一辆大车上的电影制片厂

——记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电影队 ·····	汪 洋 (58)
----------------------	----------

附录

忆《华北是我们的》拍摄经过·····	陈 晨 (69)
--------------------	----------

编后记·····	(79)
----------	------

重印后记·····	(82)
-----------	------

关于解放区的电影工作

袁牧之

一、抗战时期

解放区开始有电影工作是在1938年秋季。在延安八路军总政治部领导下成立了电影团，下辖一个摄影队和一个放映队。当时技术人员很少，摄影队的六、七个干部中，才只有三个电影专门工作者。

1939年1月，摄影队从延安出发到华北敌后，拍摄了第一部解放区的历史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

1940年以后摄影队回到延安，在国民党反动派物资封锁下，继续拍摄了：《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十月革命节》、《边区生产展览会》、《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等影片。这些影片都是在缺乏近代水电设备的困难条件下制成的。我们在放映无声片时，用留声机配音及扩大器说明的方法，来完成宣传任务，因为当时根本没有录音设备。

二、“八·一五”至东北及华北解放

抗战胜利以后，1946年4月下旬，我们接管了长春伪“满映”制片厂。5月下旬，因为战争情况，将该厂器材及部分旧有人员迁至北满合江省兴山，开始建立人民的电影制片厂——即现在的东北电影制片厂，同时拨出重要器材的三分之一及少数技术人员，进关交予华北解放区，拟在华北另外建立一个电影工作的据点（后来成立了华北电影队）。

当时我们虽然有了器材，但如何建立起为工农兵服务的人民电影事业，仍然是一个十分困难的课题。

建立“东影”厂，首先忙于搬家和安家，从长春搬到了距离佳木斯一百余里的矿区——兴山，除了器材之外，一切都要重新着手建立，当时的工作人员大部分来自伪“满映”，如何改造他们的政治认识，是当时首要的课题。而解放区的绝大部分干部，都是从未从事过电影工作的，如何动员他们去学习并掌握电影技术，也成了建厂初期的最重要的关键。同时又必须吸收广大青年，以培养大量技术方面和其他方面的干部，来适应当时与以后的需要。这样，我们便从有了器材，学习政治，掌握技术，培养干部来构成东北电影制片厂的基础。

制片工作是从1947年开始的。初期的制片方针，是先从新闻纪录片做起，从1947年5月1日生产出第一部作品起，到1948年底止，共生产了九部作品。平均约两个月制成一部。

这一阶段前后共两年时间，从最初的搬家与安家中获得了生产工具，又从工作中培养获得了初步的人力，这是新的人民电影制片厂中生产力的初步形成，接着而来的问题是如何健全新的生产关系，并尝试有计划地进行生产。

为此，遂更进一步开展了“正规化”、“科学化”、“统一化”的三化运动；订立了保证生产的公约，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上，订立了1949年的生产计划，任务较前一年增加一倍，即平均每月生产一部产品，全年制片十二部，共十万英尺成品的计划。其中新闻纪录片与故事片各半（随着东北的全部解放，“东影”厂已于本年春迁回长春伪“满映”旧址，最近因“东影”厂干部部分调北平，成立北平电影制片厂。新闻片纪录片的计划将由“平影”厂完成，“东影”厂只负责完成故事片的生产任务）。

关于华北电影队，1946年原拟在张家口成立一个电影制片厂，但当时由于该市的战事关系，不得不暂时迁至山沟里，在

华北军区政治部的领导下，成立了华北电影队。他们当时所遇到的困难，无论从人力、物力来说，比起“东影”厂的条件，则更为困难，制片工作很难开展。在客观条件的限制下，他们将大部分器材藏在山洞里，而将必要的制作器材装备在一辆大骡车上，在任何情况下，他们完全同战斗部队一样，可以随时随地转移。他们发挥了高度的热情和创造性，克服了种种困难，坚持工作，用手工业方式，完成了一些新闻纪录片。例如要从三里外挑水来冲片子，天气热，大家就用扇子搧片子，录音要靠摩托车发电，拷贝机则用旧的摄影机代替，不能调光，没有自动回转，所有这一切，唯一的办法只有用手来解决困难，但也终于先后完成了两号新闻纪录片（今年4月，华北电影队的制作部门已合并于北平电影制片厂工作）。

根据上述情况，解放区的电影事业，从两手空空发展到有规模的制片厂的建立，这期间曾与种种的困难作斗争，但更重要的是与思想进行了斗争。这是人民电影事业成长起来的主要因素。在思想斗争的过程中，不断地克服了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与爱好，而逐渐摸索着建设为工农兵服务的电影事业。

我们在这几年的过程中，不仅在为建立工农兵电影的理想而学习，同时也从行动的实践去服务。我们的编剧、导演、演员等创作者，轮流地深入农村，深入部队，深入工厂去体验生活，搜集材料，探索着工农兵电影的内容与表现方法。例如第一部故事片《桥》，一方面虽然还存在着很多缺点，但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我们创作者所共同追求的方向。

我们的摄影队（已从最初的三个队发展到现在的三十多个队），特别是其中大部分的战地摄影队，雨淋日晒，风吹雪打，在最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地随着部队行军作战，他们不仅意识到作为一个人民电影摄影员的光荣任务和作用，并因为每到一个部队，就提高了该部队的战斗情绪，因而更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极有作用的政治工作者，有了更加不顾一切、英勇牺牲

的精神，随着尖刀连、尖刀排，以至尖刀班，突击进到敌人的腹地，作战地摄影工作。也正由于这样，而不幸牺牲了我们三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解放战争流尽最后一滴血的摄影师——张绍柯、王静安、杨荫萱同志。正是由于他们这种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而获得了在中国电影史上空前的纪录片：《解放东北的最后战役》。

三、目前阶段

在解放战争全面胜利的开展下，长春、北平、南京、上海等地各敌伪制片厂已先后接管，根据新的形势，及今天电影管理工作的繁重局面，业已成立了中央电影管理局，它的任务是管理全国公私营电影事业，以及对国际上有关电影事业的一切联系。

电影管理局目前直辖之国营电影事业，暂分为制片及发行二大系统。

一、制片厂，已有东北电影制片厂及北平电影制片厂，上海方面俟接管完竣后，即将成立上海电影制片厂。

二、发行系统，现已成立东北影片经理公司及华北影片经理公司，上海方面亦即将成立华东影片经理公司，此后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发行机构与发行网。

四、主要的经验教训

人民的电影事业，在几年来摸索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与获得的经验和教训，确实是多方面的，目前尚未得机会从事全面的整理总结；为便于在文代大会上作一简略的报告，这里只提到三个主要的经验教训。

第一，从1938年到现在这十二个年头里，我们从两架敝旧的放映机，一架古老的三十五毫米的“埃姆”和一架十六毫米的小摄影机起家，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到目前马上

就要成立第三个国营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并将同时成立全国各地的发行机构与发行网，在此过程中，能够使我们在方针和方向上未绕大圈子与走弯路，这首先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对这一新兴事业的正确领导，热诚的爱护与大力支持，从党中央直到各级地方党和部队中的党组织，以及各级政府、部队、机关、团体，在一切与电影事业有关的问题上，全做了充分负责的领导与帮助，这就使人民的电影事业获得了有力的依靠，否则解放区的电影事业能够具有今天的局面是不可想象的。

第二，解放区现在已经有了一千多个电影工作人员，这包括了最早的延安电影团的人员，伪“满映”的人员，党中央从西北各单位调来的人员，东北文工一团全体人员，华北电影队的一部分人员，和正在从学习与工作中改造的伪“中电”三厂的人员，以及由我们所办的第一、二、三、四期训练班毕业的学员们，总之，是从许多不同的单位合并的。但在每一单位合并之前，我们都首先相互提出警惕，并共同抱定决心，以毛主席整顿三风的精神来彼此防止宗派主义、山头主义与小集团主义，并在一面工作一面学习的过程中，不断地与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作斗争。这样，我们才达到了基本的团结。由于团结才有了力量。这是电影事业发展过程中给我们的第二个经验教训。

第三，由于上述依靠了党的正确领导和基本上团结一致的干部条件，我们能够全体一致，以民主集中的精神，忍受并克服了一切困难，坚持并摸索着如何走向毛主席所指示的文艺方向，创造以工农兵为对象、为工农兵服务的电影。远自1938年起，以及在1946年建立东北电影制片厂的初期，都是从先用摄影机直接反映工农兵斗争生活的新闻纪录片做起，然后再过渡到加工较多的艺术片。我们的艺术干部们一方面直接地走向工农兵群众中，去学习并采访，以寻求他们创作内容的源泉；另一方面又间接地从拍摄新闻纪录片获取了经验。我们的新闻纪

纪录片和艺术片，在有关立场和方向方面所走的是一条基本上正确的道路，在风格方面即使还是粗糙的，然而也已否定了传统的抄袭，初步地摸索到了新的风格。

但是我们还是锻炼得很不够成熟的，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还很低，掌握政策还很不够，创作方面也还残留着有自然主义的倾向。以上是经验教训的第三点。

五、结 语

十二年来，解放区电影事业的发展，仅仅只能算是万里长征才开步，尚在幼稚状态中。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和解放区的扩大，解放区的电影事业也随之扩大到全国范围，而成为人民国家的国营电影企业，这一国营企业又将在全国电影事业中居于领导地位。今后任务的繁重与前途的困难当比过去更甚，但只要按照上述，依靠党的领导，紧密团结，坚持工农兵方向这三个主要经验教训所告诉我们的，更依靠于即将形成的人民民主政权的领导，更依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开诚布公地与最近会师的长期在国统区艰苦奋斗的进步电影工作者合作，虚心地相互学习，不断地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来加强团结，继续摸索主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电影，我们相信，上述三个主要的经验教训，既曾引导我们从几架旧的机器起家，而形成了今天解放区电影事业的大发展，我们将同样相信这三个主要的经验教训将指引我们得到明天国营电影企业与全国电影事业的更大胜利。

（原载《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1950年3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宣传处编辑出版）

亲切的回忆

吴印咸

1938年秋天，在八路军总政治部领导下成立了延安电影团，并决定首先拍摄一部长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正式开拍的时间是在同年10月。这时全电影团只有六人：除袁牧之，徐肖冰和我外，还有三位做政治工作和行政工作的同志。我们只有两台摄影机，一台三十五毫米，一台十六毫米。

在延安拍摄完毕后，电影团于1939年1月出发到华北敌后去拍片，要通过日军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1940年初分两路进行拍摄，一路去平西，一路去太行，一组于1940年夏回延安，一组于1941年冬回延安，这时，三十五毫米的胶片差不多要完了，后来大部分就用十六毫米胶片来拍。因胶片来源困难，所以使用得很节省。在敌人的层层封锁下，我们还继续拍摄了《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十月革命节》、《边区生产展览会》，以及《南泥湾》（即《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等影片。

《延安与八路军》是一部大型影片，前后拍摄了两年余，当时上海已沦陷，本拟送到香港去洗印，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牧之同志带到苏联去了。后因苏德战争爆发片未制成。1950年中苏两国合制的《中国人民的胜利》和《解放了的中国》这两部纪录片中，还有我们电影团当时拍摄的片断。

我们从敌后回延安不久，电影团的放映队也成立了，两架皮包机和一台发电机都是苏联送的，影片也是苏联送的，有

《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夏伯阳》……等。这些影片后来放得连片孔都没有了，放一晚要断好多次，而且看一次电影要走十几里路，但观众仍然看得兴高采烈。当时在放映队工作的有余丰、席珍、罗光、赵天培和唐泽华等。

1940年前后，钱筱璋、吴本立、周从初、马似友等同志参加了电影团，人员扩大到十几人；后来又开办摄影训练班，电影团就增加到二三十人。这时我们都住在延安半山腰窑洞里。1944年，当胶片来源愈来愈少时，我们就实行生产自给，利用废胶片制作证章，搞照相馆，办摄影展览会等，象个小工厂似的，不仅没要公家的钱，还盖了六间新屋。我们也开荒生产，还上缴了粮食。此外也参加打柴，修飞机场，帮助老百姓锄草等义务劳动。大家在党的教育和关怀下，政治热情非常饱满，很高兴，很乐观。

通过下部队拍片，给了我很大的教育。原来我只是个有点正义感的人，看到解放区的生活和军民的亲如家人的关系，受到党的教育，使我的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最初去时，我是准备拍完一部片子就回武汉的，后来就不想回去了。拍摄纪录片的过程也是深入生活的过程，而战斗生活本身是给我们很多教育的。

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形势迅速开展，电影团的同志就分别到东北等处去接收，这就是后来的东北电影制片厂。

（原载《中国电影》1958年7月号）

《延安与八路军》及其他

徐肖冰

1938年8月，袁牧之及吴印咸同志到达延安后，党对电影工作非常重视，于是在八路军总政治部下面成立了电影团，由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同志亲自领导，并选派了李肃同志担任电影团的政治与行政工作。李肃同志是一位长征干部，曾参加过宁都起义。袁牧之同志负责艺术方面的工作。当时有六个人，只有袁牧之、吴印咸同志和我是搞过电影的。

到了延安不久，就碰上日寇飞机轰炸，电影团的住所被炸了，几个人差点给炸死。轰炸后，周恩来同志及其他首长都来看我们，我们由衷地感激党的关怀。

我们开始准备拍摄《延安与八路军》，由牧之同志担任编导，吴印咸同志和我担任拍摄工作。这部片子反映了“天下人心归延安”，知识分子由国民党统治区，通过几道封锁线奔赴延安投身革命，经过学习，然后就分赴各战场参加工作；反映八路军的英勇战斗，及亲密无间的军民关系等等。第一个镜头是在陕西中部的黄帝陵开始拍摄的。那天恰好是1938年的10月1日。延安的部分拍完之后，1939年初，电影团分两路到敌后去拍片。牧之和印咸同志在晋察冀一带。我去冀中，后来和吴本立同志去晋东南。

在我们动身的前一两天，使我们终生难忘的是，毛主席于百忙中抽出时间接见我们，并请我们吃饭。被接见的有袁牧之、吴印咸和我等。席间毛主席亲切地询问了我们的工作情

况，问我们准备拍什么片子，并关怀我们的生活。我们向主席汇报了工作情况，并说明今后由于敌人的封锁，材料来源困难。毛主席鼓励我们说，你们现在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不能发挥你们的能力，但将来的工作是很很多的。毛主席又说，现在拍长征就不可能，过几年你们就能拍了。毛主席的指示坚定了我们信心，也使我们看到电影工作的广阔的前景。这些指示给我们印象很深。

我们怀着党的关怀，到华北的抗日根据地去。插入敌后往往要经过好多道封锁线，而且敌人扫荡频繁，常常一口气要跑几十里，最多的一次跑了一百四十里。电影团有一次被敌人包围，当时有袁牧之、李肃和我，幸亏部队保护突围出来。1939年底，牧之同志带着已拍过的胶片先回延安。我则带了个通讯员径赴敌后拍地道战、地雷战、“百团大战”及关家垴战斗等。首长们爱护我们，不叫上火线去。但为了完成拍摄任务，一有战斗，我们还是上去拍，并跟着部队攻地堡，有的摄影记者还给我们拍了照片。

影片中需要一段敌后游击队活动的镜头，要到敌占区去拍。部队极力帮助，通知井陘地区游击队，再由游击队找到敌占区的维持会长，叫他给想办法，要是出了乱子就找他算账。

一天夜里，我和通讯员化了装，由游击队的便衣同志带到这个维持会长的家里。这个维持会长照顾我们休息，在脱衣服时，他发现我身上带有手枪。在我睡觉时，他就与游击队的同志商量第二天活动的计划。维持会长怕出乱子，尤其怕碰到日本军队给抓去，有手枪就保不出来，那他就没法向我们的游击队交代。他们商量的结果，还是不带枪，这样就是被抓去，还能想办法要出来。

第二天一早，由维持会长带路，我们就出发了。井陘煤矿位于正太路上，我们准备在靠近铁路的地方拍游击队活动，背景是敌人火车疾驶而过。滹沱河上有农民用水磨来磨拜佛用的

香，在这里碰到了日寇，但一下就过去了，没有出什么问题。我们找来找去找到一个晚上打信号用的炮楼，躲在里面从枪眼里等待拍摄。一直等到下午才拍到这个镜头。

当我们回来后，游击队的便衣同志向队长汇报情况。队长还把他批评了一阵，认为不带枪很危险，有枪还可以在遇到敌人时，干一阵，否则就白白给弄去了。

部队处处给我们支持，千方百计地给予保护，象彭德怀副总司令、罗瑞卿将军、左权将军等首长，都给我们题过字，鼓励我们，在每次战斗结束后，都要问拍电影的同志怎么样。党从来都是重视电影工作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也关心我们电影工作者的成长。

（原载《中国电影》1958年7月号）

随朱总司令回延安

吴本立

1939年的冬天，我在敌后一个剧社里工作，这时，八路军总政治部的延安电影团为了拍摄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来到了晋察冀边区。我接到了四军分区司令部的通知，要我去见电影团的袁牧之等同志。当我会见他们之后，才知道电影团的同志们是从平西、冀中等前线拍完了材料来到四分区的。在这里拍点素材后，部分同志准备先回延安去。当时牧之同志经领导同意，把我从剧社调到电影团，让我和徐肖冰同志到太行八路军总部去拍摄《延安与八路军》影片的另一部分材料。临行前，牧之同志和我们谈了几个夜晚，详细地交代这次去总部所要完成的任务。特别在分手的那天，他嘱咐我们：摄影机和胶片要保护好，要象保护自己的生命那样去保护它。

我和肖冰同志冒着华北深冬的严寒，顶着鹅毛似的大雪，背着我们仅有的一台摄影机，在沿途部队护送下，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来到了晋冀鲁豫的太行山区。

太行山，群山起伏，巍峨挺立，片片积雪点缀着绮丽的峰浪和山涛，显得分外壮丽。这儿是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心脏，八路军总部就设在这里。

我们到达总部后，被安置在一个群山环抱的小村子里住下。一天上午，总部一位参谋同志兴致勃勃地跑来告诉我们，说总司令要接见我们，和我们谈谈拍摄影片的工作。

总司令要接见我们，这真是意想不到的喜讯。开始，我真

以为是自己听错了。总司令的工作多么忙啊！他指挥着敌后战场上的千百万部队与日寇作战，有多少重大的事情需要他亲自处理，他怎能抽出时间来接见我们呢！

我怀着兴奋而又激动的心情，跟随参谋同志向总司令的住地王家峪走去。我以前没有见过总司令，所以一边走一边就想，总司令是什么模样？是胖是瘦？他工作很忙，很辛苦，见了他说话一定要简要，不能多占他的时间……我想着想着，不知不觉就来到了王家峪。

王家峪是个不大的山村，参谋同志把我们引进到靠山坡的两间小房子里时，总司令正和刘伯承、邓小平等首长谈话，见我们来了，亲切地向我们打招呼，照顾我们坐下。

入座后，我环视一下四周。这是两间极简朴的小平房，房内陈设着两张方桌和几条长凳，桌上放着一架手摇电话机，四周墙壁上挂着密密麻麻的军用地图。虽然简单，但看起来却很整洁。这是总司令办公、待客和吃饭的房间。我们的总司令就在这样极普通、极平凡的房间里，指挥着名震中外的八路军，抗击着世界上最凶残的日本侵略者。

参谋同志把肖冰和我介绍给总司令，总司令笑容满面地和我们握手。我双手紧紧地握住总司令的手，一股暖流从手上传遍全身，血液沸腾，千言万语涌上心头，但却一句也说不出。

肖冰同志把我们来总部的任务向总司令作了汇报。总司令当场对我们工作作了指示，并勉励我们要努力工作，把坚持敌后的八路军的英雄形象纪录下来。总司令和蔼可亲、从容不迫的谈话，和在座的刘伯承、邓小平首长谈吐自如的插话，感染了我，使我原先有点紧张的心情渐渐地平静下来。这时，我才看清总司令穿着一身旧灰军服，两只袖子上还打了两块补丁，脚上穿着一双普通的布鞋。一种崇敬的心情油然而生，我们的总司令，他的生活是多么简朴啊！

谈完工作后，总司令特意告诉警卫员通知伙房为我们增添